

年

卷

期

2

1-6

第

第



輿論

刊月半

期一第 卷二第

版出日一月一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半月 和平的光榮(鳳)
簡評「被遺忘了的公教人員」(鳳)

「乞和」的是誰？……陳子展
 理性與偏見……何德麟
 評「財產關係」說……李秀生
 日本政治醜聞……孟憲軍
 美蘇與朝鮮問題……蔡振揚
 評英國國會「十字軍」世界政府委員會
 發起所謂組織世界政府運動……楊星森

「泛湖南主義」(長沙通訊)
 南遷聲中話總垣(廣州通訊)
 JUSMAG(南京通訊)

和平的光榮

人心思變，人心也在守治。

在「戡亂法令」之下，談和平者有罪。現在我們的孫內閣也在談「光榮的和平」了。凡官方沒有談的，老百姓不許談；官方已經談的，老百姓還是不敢談。

不談也罷，可是老百姓實在窮得活不下去了！「窮則變，變則通，」大家閉着嘴，心裏在「思變，」變雖比不變好，而且變得愈快愈好。

據吳鐵城氏十二月二十五日對合衆社記者發表的談話：「現內閣為戰時內閣，並非投降內閣。」此事我們不便有所批評，正是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今後大局如何？每人的看法雖各有不同，可是大致是差不多的。大家在想：如果早點和平，豈不是可以多留國家一分元氣，少死幾個壯丁？胡適說：「和比戰難，難十倍。」我說：「和

比較光榮，光榮十倍。」所以，政府所要的是「光榮的和平，」而人民所要的却是「和平的光榮。」(鳳)

恭祝 新年快樂

本社同人鞠躬

被遺忘了的公教人員

政府忙於戰爭，亦忙於和談，於是遺忘了全國的公教人員。

初改幣制的時候，公教人員每月薪津所得，尚可差堪一飽；後來開放限價，物價直線上升，雖然政府曾經一度調整公教人員的待遇，可是絕對趕不上物價的奔騰。全國公教人員，有的尚在飢餓線上掙扎，有的已經倒了下去。

今天，一個簡任官每月的收入，不及人力車夫；一個大學教授的生活，更不及銀行裏的茶役。真是「萬般皆上品，惟有讀書糟！」

承蒙立法院的大恩大德，擬訂了一個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基本辦法，可惜行政院來一個「相應不理。」後來立法院又以行政院所訂的辦法不合憲法程序，退還給行政院。恰巧那時翁內閣辭職，孫內閣繼任，在此一推一拖之中，這件「無足輕重」的公事，就此不見下文。

政府遺忘了公教人員，公教人員也不再向政府請求改善待遇，他們只是在菜色的面孔上，隱藏着沉默的憤怒和期待。

人心皆死，這纔是政府最大的悲哀！(鳳)

論壇

「乞和」的是誰？

陳子展

任人家爭論這次新內閣登台是戰時內閣也好，投降內閣也好，和平內閣也好，我們老百姓所爭的不是這些，我們不知道打官話，我們大家要求活下去，然後要求好好地活。到處飛機炸起來，大炮轟起來，子彈像雨點一樣落下來，叫我們老百姓怎麼活？壯丁硬拉去，硬要硬徵去，名目繁多的捐稅硬抽去，總之，乏力的硬要你出力，無錢的硬要你出錢，單剩一條命的硬要你去命，叫我們老百姓怎麼活！

除了附政府或套門壘斯經營的金銀企業機關，服務所得還可以過活而外，大部份中下級非主管人無從或不願舞弄食污的公教人員，單靠俸給生活，依目前情況而論，月入高者以四五百元底薪計，所得金圓券不過六七百元，約值幾個月現至多不過十來元，漫說八口之家就是二三口的人家，試問如何過活？難道叫我們這些公教人員活活等死麼？這樣還能責備公教人員有機會食污的不宜污，有能力的不自甘無能麼？公教人員大都逼得「利令智昏」，「善人獸戶」，如何會有廉潔有能的政府這一奇蹟出現呢？

儘管在二三十年前，一般人民和士大夫習慣於奴隸生活，陶醉於封建思想，要是他們活到活不了的時候，至少民間也會傳遍這樣的謠言，滿布這樣的不可遏抑的憤怒情緒：

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
士大夫也唱出這樣的詩篇：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魚在旨酒，亦匪克樂，酒雖伏美，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瘁！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之。念我獨兮，憂心惻惻！
此彼彼有屋，薰薰方有穀。民今之無極，天天是極。嚮矣富人，哀此匱獨！
(詩，正月)

而且也會要發出「投畀豺虎」的怒吼，不止于想怨了？何況生在今日「科學的世紀」同時又是「人民的世紀」的公教人員，聽慣了「自由」「民主」一類名詞的老百姓，你想要是由這些人不滿現狀，鬱積起來的怨憤和憤怒而形成的民心，不更可怕麼？

我也知道這些話聽慣革命派調與看慣唯物八股的前進朋友或新文學大作家看來，還不免罵爲老生常談，「反動分子」；雖然未必在目前再勞他們爲我散布匿名揭帖，發出毀謗新聞；也未必在將來，他們要從新向我清算，向我

鬥爭：因為據我知道的，他們也還是自命頗有正義感與自由分子，不過中間偏左罷了。在另一方面在讀飽了中國古書，繼承了中國正統思想，提倡了四維八德，有意無意的造成了王朝式的政治，這些頂天立地地繼往開來的衰衰諸公，要是說起話來，當然比我說的更漂亮，更高深，聽了在上面說這些話，料想他們的批評不外是「卑之無甚高論」，「秀才醉後狂言」。我深知道我的「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話可說，所可說的便是新內閣諸公也無法再諱言的「和平」二字了。我這一生永遠不會做官，所以我得套用後漢郭太拒絕人家勸他做官的話：

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我正和郭太一樣對當時什麼也絕望，但還有一絲絲希望，就是「和平」，馬上實現「和平」！便是拜服美國貨，(學問!)名聞國際間，中國天字第一號的京派學者，實驗主義的哲學家，說是「和比戰難萬倍」，而主張「苦撐待變」的胡博士，(有人說苦撐待變原是苦撐待機，準備到最後坐飛機飛去耳！)拉下還不會拉他的兒子，微權還不會微到他的米缸，炮火還不一定正打到他的頭上，他偏想撐也受不了苦，望變也來不及待，一溜煙就飛到南京，將來會飛到那裏，或是「拚命向前」前到那裏，都說不定。試想正在受苦受難中的善良的老百姓，以及從老百姓中間生長還和老百姓同命運的許多公教人員，這不渴望和平，真像大旱之望雲霓麼？

雖然有人說：「一直戰到對方乞和爲止。」我想作戰的雙方，如果只爲自己一己的利害打算，不到戰比對有害於自己利益的時候，都不會輕易向對方「乞和」的。那麼，「乞和的是誰」？我敢說一句：「乞和」的不會是作戰的雙方，而是沉淪在戰爭苦海的作爲一個政權基層的老百姓，和從老百姓出來而仍與老百姓同命運，作爲一個政權中堅的公教人員。從抗戰到目前的這一戰爭，時間實在太久了，我們老百姓和中下級公教人員實在熬受不得了，齊聲「乞和」了。我們認爲只要使國內絕大多數的人民脫離戰爭苦海的和平，就是「勝利」的，就是「光榮」的！別無所謂「光榮的和平」，「勝利的和平」！最少數人的「勝利」和「光榮」和我們一般人民不相干。最後我還得引用二千三前的詩句作結：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論理性與偏見

何德鶴

一 從智慧到理性

人類學家認為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有下列數點：(一)人的身體可以站直起來，利用雙手使用工具。(二)人類的大腦指數較其他動物為高，可以思想。(三)會使用語言，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意見。(四)發明文字，創造文化。人為萬物之靈，就在有上列四種天賦的人權；其原因是人類的生理構造，與其他動物不同，在生物進化史上，人類是走在最先的一個。

人類思想向高度的發展成爲「智慧」(Intelligence)。據心理學家的意見，智慧構造的要素有四：(一)配憶力；(二)想像力；(三)判斷力；(四)社會適應力。(Sociality)，人類智慧的獲得，一方面是承受前人的經驗，另一方面是接受別人的知識，社會學上叫做「文化的累積」(Culture Accumulation) 因此，我們可以說：個人的智慧是「聰明」；「某人的智慧是「文化」。有了文化之後，配憶力的總匯是歷史，歷史的教訓可以作爲未來的參考。想像力的發展創造了文學與藝術。判斷力的行使，形成了倫理觀念與邏輯的引用。社會適應力的配合，決定了人類活動時各種的社會關係。同時，文化累積的結果，在科學和技術上有新的發現與發明，人類的智慧不斷的向前進步。

智慧的進步與理性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以判斷力一點而論，始人的判斷是直覺的，以個人的

好惡爲判斷的標準；因爲原始社會中人類的社會關係比較稀疏，一個家庭便是一個社會，對於事理的斷判不需要其他的標準。在家族社會進步到部落社會的時候，判斷的標準，就需要大家來決定了，這種決定名爲「公意」(Public Opinion) 遵循公意的思維名爲「理性」(Reason)

再論社會的適應力，人類適應其所處之環境有兩個條件：其一，要具有習慣性；其二，要使個人生活的方式與環境配合，這就是所謂合理的生活方式了。「合理」，便是「理性」與「環境」的符合點。因此，「智慧」與「理性」有不可分開的關係，人類智慧的發展，是走向理性的途徑。

二 理性與理性主義

飲食男女的慾望，名之爲「天性」，剛柔內外的人格，名之爲「個性」；合理的推論與正確的判斷，名之爲「理性」。推論如何可以合理？西洋思想家認爲要借重於邏輯，主觀的邏輯是「方法論」，就是探求真理的道路與尋找結論的方法。客觀的邏輯是「因果律」，就是探求事理因果關係與尋找自然界的原則。判斷如何可以正確？這不得不借重於經驗了，根據個人本身的閱歷與人類歷史的教訓，對未來的事理作預知的判斷。中國人認爲有判斷力的人，必須「事理通達，心氣和平」。

用邏輯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現象，是有效果的。用邏輯去研究社會現象與政治問題，就不能那樣機械了：因爲社會現象是變動的，變動的現象，應當

用變動的法則去研究。至於政治問題，也極其錯綜複雜，有時間性亦有空間性，解決政治問題，亦需要變動性的法則。

社會現象中的因果關係，是多元的。社會法則的或然性多於必然性。這就是說：社會現象必須在某種條件之下，纔能形成某種的結果。社會現象，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不能認識社會現象，也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每一個時代有其不同的政治問題，尤其在政治革命上表現得最爲明顯。歷史上的宗教革命在反抗僧侶階級的特權；民主革命在推翻暴君的專政；社會革命在打倒掠取人民生活資料的資本家。所以歷史上每次的革命各有其重點，而每次革命者的主張亦各有不同。

拿空間的差異來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特殊的本質，每一種人民也有他們不同的需要，張冠李戴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如在蘇聯不會產生英國式的費邊主義，在中國不會產生美國式的民主一樣。在這裏，我們就不得不認爲在社會現象與政治問題上「理性」是可動與可變的了。

說得具體一點，拿中國爲例：過去我們認爲忠孝節義是一種美德，忠臣孝子與節婦義士，是社會上的模範人物，他們殺身成仁的行爲，一般人都認爲是具有最高的理性的。可是到現在，我們認爲他們的行爲是封建的與落伍的了。自從民主思潮捲到這世界上以後，人類最高的理想（也就是現代理性的標準）是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榜的口號：自由，

平等，博愛。

十八世紀的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產生了一種理性主義（Rationalism）在哲學上它是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及唯情主義（Sentationalism）對立的。這一派的學說反對用直覺的感官去獲得知識，認為只有純粹的理性，是一切知識的基礎；理性是從智慧行動中獲得的。（Derived from the Action of the Intellect）

阿羅得（M. Arnaud）說「宗教不是理性主義」（Religion and Dogma）泰諾說「要在生活上找轉靈，我可以走向放任的肉慾生活，或者走向冷酷的理性主義。」（見Logic in Theology）由此可見理性主義是反直覺的，「非宗教的，」和「禁止放任的」哲學思想。

理性與理性主義就有所區別，我不打算在這裏研究理性主義，且繼續討論「新社會中的理性。」

三 理性的展望

在神學時代，上帝是理性的代表。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見舊約一四章）可見在宗教的意義上說，上帝就是理性，宗教的經典，是理性的張本。

在哲學時代，對於理性的看法就各有不同了：西洋人談理性，着重於「知識的發展」，認為不斷的學習，可以產生最高的理智，他們把理智與理性是合而為一的。中國人談「理」，是說明人類的倫常觀念，君臣父子的關係在於「理」，「揖讓進退的規則在於「理」，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的大道亦在於「理」。」「理」與「禮」相通，所以有「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的說法。

在科學時代，理在數學，天文，與物理等科學上有極大的貢獻，從演繹與推論中，把理變為思維的發展，於是相對論與原子論等的新發明，都是由嚴密的推論而來。只是在社會科學上，二十世紀對於「理性」的解釋，依然說脫不了十八世紀民主

思想倫理觀念的傳統——自由平等與博愛。

我們當然也不忽略在二十世紀的思潮上。橫梗着兩條戰線：一是達爾文與馬克思等所遺留下來的鬥爭的哲學，認為只有在不斷的互相消滅中，文化的機能成長。一是聖西蒙與克魯泡特金等所遺留下來的和平的哲學，認為只有人類互相助愛，世界纔能繁榮。這兩種理論的對立，使我們徬徨於歧途。我們的看法，以為整個的歷史，無非是不斷的戰爭與和平的極端，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戰爭畢竟是手段，和平纔是目的，能够避免戰爭的和平，互助互愛。

理想中的社會，不僅是在科學與藝術上應有高度的發展，同時要建立合理的制度：財貨要共有，社會要安寧，政治的目的在為全體人民服務，法律要低到最小的權力，國際關係要平等相處。在這裏，我們展望未來，理想中的社會最合於經濟原則的，就是以最少勞力，獲得最多的報酬，用最小的犧牲，獲得最大的代價。

今後的理想，應當以「人」為中心：「人道」（Humanity）應受尊重，儘量地避免互相殘殺。「人性」（Human Nature）應有發揚，人的意志不受暴力的壓制；人權（Human Right）應得保障，維護人的尊嚴與人的自由。

今後的理想，應當以「物」為目的：改良物的環境，增加物的生產，利用物的能力。理性，不是指通常的倫理觀念，而是指集體工作的效果；有理性的人，必須參加實際的工作。理性，不是指玄學上的諷刺，而是指功能上的成就；有理性的人，必須有利於人羣。理性，不是指預知的判斷，而是指目的實現；有理性的人，必須有生活的理想。

四 理性的障礙偏見

理性的障礙是偏見；（Prejudice）是個人與團體的偏見。

一個英雄主義者通常是有偏見的，他有優越感而且自視頗高，有時驅策羣衆，從事殺戮；萬一成功了，而成功的代價是千萬人的血肉，這是失去理性的人。

一個空論家，玩弄他的演繹法，建立一種理論上的偏見，沒有把握政權之前向別人宣傳，獲得了政權之後要別人聽訓，如有所行，錯誤百出，而他則至死不悟，這又是一種失去理性的人。

理性最大的障礙，是團體的偏見，就是一羣人的偏見：

一種主義的產生，是針對著某一個政治現象而來的，因此政治上的主義有空閒與時間上的限制。世界上沒有一種主義是永遠不變的，否則政治就變成了宗教。然而不幸得很，許多主義的信仰者，把若干年前的主義奉若經典，敬若神明，偏見鑄成了大錯上迷的情形，在政黨政治上表現得最明顯：政黨的門戶森嚴，互相傾軋，無微不至；同樣的理論出於同黨黨人之口，是至理名言；出於異黨黨人之口，是邪說異端。有黨紀在，黨員不能自行發表主張；有黨紀在，黨員沒有個人的自由，政黨的組織，必然形成一種「集合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而這種集合意識，最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偏見。

由此類推：宗教團體，職業團體，以至於鄉土團體，都各有其偏見，這些偏見，不但阻礙了理性的發展，而且引起了人類不必要的鬥爭。

一部歷史，充滿了人類的偏見，一部歷史，也充滿了偏見之間互相衝突的記載。雖說理性是有變動性的，但是在同一個時代裏，人類應有理性上共同的標準，大家都向同一方面而努力。如此，社會的秩序可以安定，社會的和諧可以完成，社會的理想可以實現。

今天的世界又墮入偏見的鬥爭之中了：西方在進行險惡的冷戰，東方是一片大海，要阻止人類的浩劫，除人類思想上的偏見，重建新時代的理性！

評「財產關係」說

李秀生

——並就教於樊弘先生

一年來，樊先生在各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確屬不少；樊先生是有他自己的套思想體系的。他認為：「人的一切的實際的行為絕對不受他的知識支配而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或財產關係的支配。」因此他始終抓住「財產關係」這個核心兜着圈子，於是他的「一切評論，就都以此作出發點。在樊先生心目中也許認為「財產關係」這一「鐵則」，正像當頂的太陽，它的光芒似乎可以照透理論的或現實的一切虛偽和謬誤的吧。

無疑的，樊先生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因此他所「發現」的這一個自以為無往而不準的「鐵則」，也並不新奇，它仍舊未脫唯物史觀的巢臼，不過是把其中的「生產手段」這一概念單獨提出來而作一番演繹罷了。這也就是馬克斯底「經濟決定論」的較狹義的解說；亦就是對私有財產制的詛咒，對資本家、地主、買辦洋奴以及現實的腐敗貪污的局而所發出的憤怒的吼聲！然而，在此作為革命的「宣傳」則可；因為這簡單的教義足以激起農工大眾與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底反抗情緒，足以集中他們的意志和力量去面對敵人。但站在「求真的學術的或科學的立場，要認為樊先生的這種理論即是真理則不可。因為樊先生在理論上實先天地犯了「以偏概全」的「將原因和條件相混」的毛病，因之在邏輯上推演出來就發生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今試提出疑義以就教於樊先生。

我以為並非非人（社會化了的人）的全部行為都受

其「財產關係」的支配，這就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亦可求得證實；「財產關係」說只能解釋人類底一部分甚至小部分行為；就一般而言，祇當人類的生存條件或活的安全受到侵害或有受侵之虞時，他的消極的保護行為以及其動機是在增進改善其物質生活的積極的經營行為，可以說是受其財產關係支配的；然而這兩類的行為畢竟在人的全部行為中佔着很少的分量。而樊先生一口咬定：「人的一切的實際行為是受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或財產關係的支配」的，不免以偏概全，是見樹而不見林。而且，依照財產關係說，其必然的推論是人的所有的行為之目的均在追求財富，累積財富了。樊先生更肯定地說：「人的一切的實際行為是絕對不受他的知識支配的」。人類真如此簡單麼？如然，則今日科學的進步，蔚然的文化，社會的維繫當為絕不可能之事。人類將永遠停滯於原始的草昧的時代裏。因為人類既「不受他們的知識支配而是受他們的取得方式支配」，則彼時人類之取得收益的方式或是果實的採摘，禽獸的捕捉等而已，那麼，只要當他感到需要時，「採摘」「捕捉」可矣，大自然所生產的儘可滿足他的需要，他的「實際行為」似乎也祇該止乎此；他不必受知識的支配去發明工具，組織團體，甚至去競避災難與死亡。因為工具發明，團體的組織以及利害的辨別都應包含在根據人類的經驗而促成的知識活動的範圍以內的。若樊先生認為這種推論是荒謬的，那麼首先須請樊先生將「知識」「行為」這兩則概念作一具體的界說；很顯然

的，在這一點，在樊先生的文章裏，未曾使我們得到

滿足。其次，若又以這種推論是違背「凡思想學說是適應其特定的歷史階段的」這一原則的話，則我們更可舉出許多實例反證樊先生的理論：中世紀的伽利略如受其財產關係的支配，他絕不會冒死刑去發明地動原理（樊先生在本年六月號中國建設所發表的「知識、思想、行為」一文中只說到利奧伽利略死刑的宗教法庭的裁判官是不受科學知識的支配的，而伽利略為甚麼要冒死刑發明地動原理却避而不談）；薩佛那羅拉（Savonarola 1453—1500）儘可不主張思想自由並攻擊教會濫用職權而著教會活用火刑燒死；近世紀科學的知識份子如孟德斯鳩，盧梭等都曾遭財產沒收，身禁牢獄，逐出國境的橫禍，但他們不為所屈，仍點燃了法國革命的真理的火把；馬克斯偉大學說的劃時代的貢獻，總不能即被蓋解釋是受其財產關係支配所致吧；國父孫中山先生如欲保持並發展其財產關係，儘可做一個小地主或經營國際貿易也絕不會屢盡危難與失敗去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再問樊先生在講學為文的時候，是否也純然受着自己的財產關係的支配？目的是否亦企圖發展自己的生產手段？如然，則樊先生儘可不必領取那微薄得可憐的薪俸，度着清苦的生活，而投身買辦洋奴的陣營，或以自己的文才去「貨子帝王家」了；但，在筆者如此說來，也有幾分不忍，諒樊先生自己即使凍餓以死也絕不會走這一條路的……不必再舉了，而樊先生竟說這些人是「少數的例外」，但就由於這「少數的例外」，由於他們的知識所開出來的奇葩和迸出來的火燄，纔使學術思想推陳出新，文化進步無已，使文物制度

因時而進，社會發展日愈加速。於此，樊先生在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一卷八期平版中述）一文中所答覆的第一點似難成立，所答覆的第二點謂：「縱令少數的地主和資本家反對土地和資本所有權，他們必然把土地和資本所有權無奈何。」這顯然的肯定了人類對於物的奴隸性，而否定了人類在歷史過程中為唯一主動的自覺的因子之地位。馬克斯也不會否認這個因子（指人類）的作用，却積極肯定了人感作用；他說「哲學家僅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但重要的還在改變世界」，而只有人才能去改變世界的任務，因為人總是環境中唯一能自動而有意識的因子；一切都是被動的無意識的，要有了他，一切才能走進歷史。馬克斯底全部「費爾巴哈論綱」就充滿了這樣的精神；他還責備普魯東（Proudhon）忽視了這件事情。他說：「經濟學家普魯東先生很明白是在已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絲織物，麻織物，毛織物，但這些已定的社會關係也非常之同於布麻等等一樣是生產出來的，就為他所不明白了。」又說：「唯物論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底產物，因此人底改變是環境底改變之結果，却忘記了改變環境的正是人……」因此，我們知馬克斯的客觀主義不是機械的，宿命的（不幸樊先生的論調就染上了這種色彩）而是人類的，實際的——鬥爭的。所答覆的第三點謂：「他們（指資本家和地主）在大多數的場合裏，雖然口裏反對它，但手裏却不能不要它。反對土地仍要土地，反對資本仍要資本」。但是，如果我們所理解的土地和資本並不是活著血腥的罪惡的象徵，而是人類賴以生

存並發展生活的條件的話，那麼「土地」與「資本」之為物，也就沒有什麼值得詛咒的了。資本家、地主、特權階級、買辦洋奴可說是生產發達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畸形的產物，其取得收益的手段或財產關係亦即部分人類的自私性（並非指整個人性）之畸形的高度的發揚；正如一個人在生長成熟中常生的疔瘡及其他毛病一樣。我們固不否認一個小疔瘡的影響（勢力），它是可以妨礙生理上的正常發展或威脅生機的，但由於人類的知識（並不用作抽象的觀念）之發展，這疔瘡等等毛病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對於今世不論左右所一致憧憬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欲促其實現，亦必須求鑿於人類的真正知識和自動的覺悟並積極的行動，而絕不可遂以「財產關係」來支配我們行動的方面，否則，人類將無步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可能。

因此，並不是人的財產關「支配」或「決定」人的一切實際行為，它的不能作為「決定」的因素，也就是說，財產關係不能左右人的全部行為的方面，財產關係不是人的全部行為為終極的指揮。當人對真的追求，善的追求，或美的追求的時候，他決不計算利益，亦即在他的觀念中絕沒有金錢、土地、資本等的存在或如何「取得」它們等等的考慮。財產關係只是人類生存的「條件」而不是人類生存的「原因」，亦即祇是人類賴以生存的「什麼」(What)而不是人類生存的「為什麼」(Why)，當然，這真的條件是歷史的，它是隨着社會的進化而異其形態的。法國烏爾特曼(L. Wolman)說：「歷史的唯物論與哲學的唯物論一樣，有根本上的毛

病。它把條件與原因弄混了。物質是精神表現的一個條件，而不是它的原因。從我們的思維方面明白了生活、行動底物質條件的人，不能說因此也就明白了存在於這些條件和生活自身間底關係。怎麼樣地有如此的物質條件就產生如此的非物質（即指觀念形態如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等）結果呢？」樊先生的理論就是把條件與原因弄混了的，因而，照他的推論我們將無法解釋許許多多的事實，生命總比財富以「取得收益的手段等要重要些吧，然而歷史上就往往有許多大科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為了證明一個真理，為了創立一種學說，為了克盡一種責任，為了堅持一定的信仰，他們是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臭皮囊」的！這裏，樊先用却要笑他們是「傻瓜」了。然而人類正急迫需要這一類「傻瓜」來拯救他們於活埋之中，却憎惡唾棄那一批為自己現實的利益或企圖將來的利益之「智者」的行徑。

總之，依照財產關係說勢必發生很危險的結果，它將使馬克斯所說的「社會化的人」不能成立，使人類在情感上的交感共鳴為不可能，它鬧到了人實際的崇高寶貴的方面，也褻棄了人類文化精美深遠的大部分，它祇強調着那粗糙的膚淺的一小部分而已——這也就是今日所謂「前進思想」的激進的特色。可是，我自己只是一個貧苦出身的寒酸的書生而已，我絕無意也不能為資本家、地主、官僚們的「代言人」，所以我還希望樊先生的理論終能收到「宣傳」的作用，給這一批社會之蠶以精神上的和實際上的打擊。卅七年十二月十日於復旦

日本政治醜惡相

孟憲章

當日日本投降周年紀念日，代表盟國管制日本之盟軍總帥麥克阿瑟，曾盛誇其管理日本一年來之成績，中有下列幾句非常贊譽的話：「日本已於一夜之間，完成一大革命，此項革命，可與英國大革命章，美國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媲美」。日本投降快三年半了，試一檢討其國內政治現狀，對於麥帥此種過譽之言，不禁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日本政治現狀，可從(一)一般政黨腐敗墮落，(二)貪污成風，與(三)政治趨向日趨保守反對三點，分別言之。

(一)一般政黨腐敗墮落 戰後日本一般政黨(新興政黨除外)，皆為戰前或戰時舊政黨之變相的存續。就其勢力比較大者言之：如自由黨(後改民主自由黨)可視作政友會之化身。進步黨(後改民主黨)可視作民政黨之化身。社會黨則為社會大眾黨之化身。從對面招牌觀之，自由、民主、進步、社會，都是何等冠冕堂皇的冠詞！但從其本質看，却具有下列一般特徵：(A)全是職業政客集團，只以議會中議員為爭取對象，而不注意吸收黨員與爭取民衆。(B)政黨多角式的變換，黨人多方面的流動，併黨、分黨、脫黨、跳黨、轉黨、棄黨、賣黨、救黨之事，已成家常便飯。最顯著的例證，如：蓮田均原隸自由黨，因與黨首吉田不合，遂與進步黨少壯派犬養健等合作，將進步黨改爲民主黨。但因長足犬養潛勢力，又設法將犬養逐放，並打倒民主黨原總裁幣原，繼任總裁。民主自由與民主兩黨，本都是保守政黨，其所以終不能形成聯合保守陣線者，實因吉田與蓮田兩人間有不可解之仇恨。最近蓮田因賄賂案辭去民主黨總裁，犬養繼任，聯合保守陣線之呼聲，遂又高揚。而幣原自被蓮田排出後，亦改入自由黨，任該黨顧問(三)皆維護天皇制國體，代表大資本家與半封建地主利益。

(二)貪污成風 日本一般政黨，既均代表資本家與地主利益，則因官僚財閥，互相勾結之結果，當然是貪污成風了。當日日本投降前夕，日政府曾藏匿大批物資，以後全落入日本官僚手中，實為戰後日本大規模黑市物資主要來源。去年夏，日自由黨議員前吉田政府藏匿財產調查委員會副主任瀨古，曾發表談話，譴責日政府：通同藏匿價值約七百五十億元之物資，牽涉若干大臣在內。最近又連續暴露幾件大賄賂案，如昭和電工業，織維案，煤炭國營案等。前二者，即政客官僚，利用日本復興金融庫以膨脹通貨形式所得之資金，低利濫貸於財閥企業，財閥則從中提出一部，美其名曰政治獻金，作爲報酬。特別是因昭和電工業之被拘訊者，竟有前首相民主黨總裁蓮田，前內閣官房長官社會黨領袖西尾，前經濟安定本部長官栗栖等。後者爲日本國會議員，因受煤礦主之賄賂，將煤礦國家管理法案，完全修改變質後予以通過。此案牽涉議員人數甚多，吉田亦有重大嫌疑。而日本經濟學家風早八十二，亦曾揭開一國營鐵路局購煤之黑幕，即所購之煤，係最下之質，而所出之價，則高於最上等者，致使本應賺錢之鐵路營業，發生甚大赤字。日本政客官僚，盡蝕國家資本，助長財閥資本，有如是者。

(三)政治趨向日趨保守反對 當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一次吉田內閣，因爲實施通貨膨脹，製造新聞階級，遭受廣大民衆之反對，被迫辭職時，盟總乃扶植社會黨總裁片山組閣，作爲那時席捲全國的罷工大風潮中的避雷針。片山所領導的社會黨右翼分子，多是勞動貴族，本不足以代表日本勞動大衆。但隨着日本右翼勢力之抬頭，即此冒牌的社會黨亦不能立足，不得不讓位於鮮明右傾的民主黨，由老外交官官僚，在戰時曾任日本英文時報主筆，鼓

吹侵略戰的蓮田出任首相。他力主摹仿美國，通過反勞工法案，並成立非日活動調查委員會，並頒布所謂波茨坦政令，取消公職人員之團體契約權與罷工權，以討好盟總，取悅起潮洶全國之波浪式罷工潮。及昭和電工業發，發激起瀨古與內閣「一渣子內閣」的蓮田被迫辭職遂又由最保守反對的更頑固的民主自由黨總裁吉田，再度組閣。他公開的反對中道政治，主張完全自由的資本主義。當首相選舉前，召開五黨首會議時，其餘四黨首，原皆表示願擁護吉田組織本國一致內閣。而吉田態度冷峻驕蹇，拒人於千里外，致召來其他各黨全體不合作，遂使內閣提案，除盟總投意者如修正公務員法等外，全通不過議會，乃有此次解散議會之一幕民主劇上演。因盟總對吉田之極力支持，與犬養繼蓮田任民主黨總裁後，民主自由黨與民主黨成立聯合保守陣線之可能性極大，吉田將第三度組閣，大政已不成問題。加以日本瀰漫全國之法西斯運動，日漸高漲，與美國鑒於國際情勢之發展，對日本逐步抬頭之民主運動，採取高壓態勢，日本上層政治向保守反對邁步前進，殆已成爲不可挽之定局。

英國某議員曾說：「麥克阿瑟謂日本爲民主黨，實則不如稱爲民主之裁判台，較爲恰當。」紐約先鋒論壇報說：「一如有人以爲一九三八年之日本，和一九三七年，在本質上已有若干改變，實屬錯誤之至。不知負責管制日本之盟總當局，聞之作何感想？」

本社徵求下列各地經售處：

重慶 成都 蘭州
昆明 貴陽 香港

美蘇與朝鮮問題

蔡振揚

由於第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承認美國支持下的南韓政府為朝鮮合法的政府，並設立「新朝鮮委員會」，朝鮮政局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欲知這一個新階段的真面目，先得一看朝鮮問題由來。

遠在開羅會議（一九四三年）的時候，關於日本領土問題的決定中，即連帶決定朝鮮的前途。因為在開羅會議宣言中，曾經明白規定：「決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強元首舉行雅爾達會議的時候，為了同盟國作戰的便利，所以三強有一種默契，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暫時由美蘇兩國軍隊佔領朝鮮，期限五年。是年七月，「波茨坦」宣言，對於處理朝鮮問題的方針，有了原則性的決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決定依照雅爾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的決定，對解放後的朝鮮問題，又有四項具體決定，其內容是：

一、為重建朝鮮成一獨立國家，創造各種依據民主原則發展的條件，為儘速清除日本在朝鮮統治的惡果起見，將設立一臨時朝鮮民主政府，該政府將採取各種必要步驟，以發展朝鮮的工業、農業及朝鮮人民的民族文化。

二、為協助組成臨時民主政府，並為籌劃初步適當辦法起見，由朝鮮南部的軍司令部及朝鮮北部的蘇軍司令部，組成聯合委員會。在準備各項建設時，該委員會應與朝鮮民主政黨及社會團體諸議

，該委員會製成的建設，應先送交美、蘇、中、英四國政府考慮。然後由參加聯合委員會的兩國政府作最後決定。

三、聯合委員會協助朝鮮民主政府及朝鮮各民主政黨，擬定各種方案，以提議多協助朝鮮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進步，建立民主自治及朝鮮之國家獨立。該委員會於諮商臨時朝鮮政府後，應將建議送交美蘇中英四國政府聯合考慮，俾關於四強在朝鮮為期五年的託治制，得以成立協定。

四、為考慮各種有關朝鮮南北之緊急問題，並為期建立朝鮮南部美軍司令部與朝鮮北部蘇軍司令部，在行政及經濟上之永久合作，美蘇兩司令部的代表，應於二星期內舉行會議。

可是，自這次會議以後，美國已日益露骨地採取了反蘇反共的擴張政策，違反了開羅會議的決定，並放棄了波茨坦宣言及莫斯科會議的原則，南韓的美軍司令霍奇把南韓視為理想的反蘇前進基地，一方面是盡力扶植李承晚的親美反蘇的反動派勢力，另一方面是拚命壓制民主勢力的成長，造成全韓的兩極化。

一、美國不願意見出南韓，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兩年間，美蘇駐韓當局開過無數次的會議，經過多次的爭執，終於失敗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美蘇佔領當局組成了聯合委員會，在漢城舉行首次會議，商討成立朝鮮臨時政府。至五月六日，漢城會議無結果而散。十一月間蘇聯雖曾建設恢復，美方未加考慮。美蘇協

商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美蘇對參加朝鮮臨時政府的政黨問題，未能獲得一致的意見。美國主張所有政黨都有參加政府的權利，蘇方則認為南部右翼政黨佔單位數量上最大優勢，他們反對託治，結果實際上必易為某一強國單獨操縱，使未來的政府帶有反蘇反共的本質，所以堅主只有同意莫斯科決定託治原則的才能參加。此外，美國堅持在臨時政府名單中，右翼黨派佔十七名，其他黨派佔三名，這提案又為蘇聯所反對。於是，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也就全部陷於停頓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馬歇爾國務卿致函莫洛托夫提出解決朝鮮問題兩項步驟，莫洛托夫於五月十日覆函表示贊同，聯合委員會就在五月二十日恢復工作。初時談判，雙方情緒尚稱融洽，但是後來談到選舉問題，終於不歡而散。因為要求參加普選的朝鮮黨派社團，南部美佔領區有五百多個單位，而北部蘇佔領區却只有二十四個。蘇聯拒絕南韓那些繼續反託管的黨派社團參加，美國則堅持允許他們參加。而且美方提議這個繼續反託管的黨團，將在未來臨時政府中佔十七席，只留三席給左翼的民主國民陣線各黨派。到了九月間，美蘇的協商，終於無法繼續了。

美國為着打開漢城談判的僵局，便在八月二十六日正式建議在華盛頓召開中美英蘇四國會議，共同解決朝鮮問題。當時中英兩國更表示同意，朝鮮右翼黨派自然表示贊同，主張應邀請朝鮮代表列席。但蘇聯則加以拒絕，他們認為朝鮮問題儘可遵照一九四六年六月間，由美蘇聯委會協商解決，過去兩年的

失敗備為一方未能誠意履行決議所致。美國既無法利用四強會議，而又不願實行莫斯科決議，便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希望利用自己在聯合國機構中的多數，以壓倒蘇聯，按照自己的意志，解決朝鮮問題。

九月二十一日聯大綜合委員會討論大會議程，以十二票對二票，通過將朝鮮問題列入大會議程。蘇聯為了更堅決有力地反對這種行動，到了九月二十六日朝鮮美蘇聯合委員會議席上宣布：「如果美國代表團同意所有外國軍隊於一九四八年初自朝鮮撤退的建議，蘇聯軍隊準備與美國軍隊同時撤離朝鮮」。這個有力的反攻，在國際間激起極大的波瀾。直到十月十七日，美國正式向聯大提出新方案，同時拒絕了蘇聯共同撤兵的建議。

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提議：各佔領國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分別在佔領區內舉行選舉，作為依照這個建議所附條件規定的程序，組織國會及成立國民政府的第一步驟。一俟朝鮮國民政府成立後，該政府即組織自己的保安部隊，並與佔領國協議，提早撤退美蘇兩國軍隊。蘇聯代表在反對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主張失敗後，即向聯大提議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參加聯大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美國立刻加以反對，並建議設立「朝鮮委員會」。蘇聯代表葛羅米柯堅決表示反對，他指出此舉的用意，是企圖用聯合國機構作幌子，來掩飾美國對朝鮮內政的直接干涉。結果，英美集團在多數表決的方式下，通過了設立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否決了蘇聯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參加聯合會議的提案。

從此，美蘇對於朝鮮問題的協商，完全陷於破裂，而朝鮮兩極分化的局面，也就益發明顯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美國的「朝鮮獨立方案」之後，美國在聯大是勝利了，但是蘇聯則堅決反對及不合作，於是，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協議，以及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也就宣告終了。

今年初，聯合國朝鮮委員會派到漢城調查，一月十六日，致函蘇軍司令，要求准許進入北部蘇佔領區。蘇聯認為聯大的決議案是違法的，北韓的報紙一致抨擊美帝國主義開始干涉朝鮮內政。因此，朝鮮委員會只能在南韓活動，結果徒然促使朝鮮形勢南北分裂的局面。可是，美國心有不甘，還是利用了自己已在聯大的優勢，利用「小型聯大」（蘇聯及東中歐五國始終未曾參加這一組織），在二月二十六日通過了「南韓單獨選舉」的決議案，由朝鮮委員會決定五月十日在南韓舉行普選。

朝鮮人民對於分裂朝鮮的南韓普選，向來是堅決反對的，「小型聯大」通過南韓普選決議案後，北韓各黨派和人民團體就致函南韓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呼籲一致行動，粉碎分裂的陰謀，並建設在不平等舉行南北韓民主黨派及團體聯合會議，「為粉碎分裂朝鮮，及加速建立獨立統一自由的朝鮮而鬥爭」。這個呼籲立刻獲得南北韓人民的擁護，於是，南韓的右派領袖如金九、金奎植等衝破美軍封鎖綫，到平壤開會去了。平壤會議於四月十九日開幕，至五月四日結束，參加的團體共四十六單位，代表五百四十五名，南韓方面為朝鮮獨立黨、民主獨立黨、南朝鮮勞動黨、人民共和黨、勤勞人民黨、新進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動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北韓方面為北朝鮮勞動黨、北朝鮮民主黨、青友黨、北朝鮮婦女同盟。四月三十日，平壤會議發表公報，宣示下

列共同協議：

(一)在目前情況下，依照蘇聯建議，外國軍隊同時退出朝鮮國境，實為朝鮮問題唯一正確而公正的解決辦法。

(二)南北韓各政黨各社團的領袖聯合聲明：外國軍隊撤退以後，他們決不容許發生自相殘殺的內戰，或發生違反朝鮮人對統一熱望的任何動亂。

(三)外國軍隊撤退以後，簽名本公報的各政黨與社團，當在全朝鮮政治會議中，立刻成立一個民主政府，代表所有多階層的朝鮮人民，在全國行使政權。

(四)南北韓各政黨社團一致反對南部分裂的選舉，也決不支持選舉後將成立的分裂派的政府。除了公報以後，平壤會議並決議：建立南北朝鮮統一的中央政府，和致函美蘇兩佔領軍當局，請求美蘇軍隊同時撤退。蘇聯立即覆文，表示願意撤兵，但美軍司令霍奇則發表聲明：美國軍隊拒絕撤出朝鮮。

接著，美國不顧南北韓聯合會議的決定和要求，依舊決定在五月十日舉行分裂的「南韓普選」。五月八日，南韓全境會發動總罷工，重要的口號是「抗議分裂朝鮮的南韓選舉」。南韓美軍當局和南韓右翼份子，為着防範人民有組織的反抗，就組織一個「志願民團」，搜查居民住宅，舉行登記，勒令在五月十日參加投票。漢城自十日清晨起，即由七千名武裝警察，一千五百名特別警衛隊及五千名自衛團「擔任警衛」。在這一天，漢城變成一座戒嚴的要塞，每一個十字街頭都架起了機關槍，武裝警察沿街巡邏，每一個投票所的職員也都攜械防身。「選舉」結果，極右派領袖李承晚和金性淳當選為正副總統，八月初，「國民議會」以一百一十票對八十四票通過了李承晚任第一任總理，繼而組成內閣。

。十五日，南朝鮮的「大韓民國」宣告成立。

北韓人民為着反對南韓的普選，也舉行最高人民議會的選舉，八月二十五日選出了二百七名代表，南韓四百名代表也參加了這項選舉。廿七日，最高人民議會通過憲法。九月九日，「朝鮮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最高人民議會一致選舉全日成爲首任內閣總理，朴憲詒和洪命熹（南朝鮮民主獨立黨）爲副總理。九月十日，最高人民議會通過決議案，以照會致送美蘇兩國政府，要求兩國軍隊同時從朝鮮撤退。蘇聯最高議會主席認爲蘇軍自北韓撤退，是非常合時，並且希望美國也自南韓撤退駐軍。蘇聯部長會議，便在九月十九日，根據最高議會的決議，決定下列兩點：（一）將留駐北韓的蘇軍撤回蘇聯；（二）調令蘇聯武力部開始從北韓撤退蘇軍，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以前撤退完畢，至於美國呢？它遲不答覆，顯然的，它是不願立刻撤退駐軍的。

四

當十月二十日蘇全開始從北韓撤退時，又正值在巴黎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大會要討論朝鮮問題時，南韓半島最南端的麗水城，突然爆發了嚴重的「叛變」。參加叛變的軍隊，說是警察隊，後又說是警備隊及新軍第十四旅。叛亂地區迅速擴大，二十日當日佔領麗水，二十一日攻克順天，直達麗水北四十英里的求禮國；更自求禮國攻入智理山區，佔

據麗水北六十餘里的保山鏡；實城、長興、先陽、岳利，相繼被佔。叛軍進攻方向有三：向北進入智理山區，以建立游擊隊根據地；向東連迫晉州，以謀取巨濟島共軍的接濟；向南攻取先陽、實城，以便政府軍壓迫時退入濟州島，這次叛變的基本原因，據法新社記者的分析：「按朝鮮新軍建立開始於一九四六年初，最初名爲警備軍，置於國防部統轄之下，新軍總數約爲一萬五千人，其中三分之二皆訓練有素的士兵。此批新兵大都爲青年學生及農民，其中大部份人受到共黨的影響，反對現在的南韓警察及現政府。……因此警察局稱：現在新軍有百分之五十係共黨。至於南韓的軍官則大部份係在解放前返自中國的，都是金九及金奎植等人的黨徒，因此皆與金九及金奎植相同的政治主張。」：南韓的新軍大部皆爲共黨及左派軍官，因此皆贊同推翻李承晚政府，與北韓聯合」。由此可知，麗水叛變是有政治意義的，完全是爲了反抗李承晚政府。

現在，南韓政府軍已於九月二十八日消滅了叛軍的一切抵抗，但是，由於南韓人民的反攻李承晚政府，南韓叛變恐不易一鼓蕩平，此類事件仍可能接續發生。

在第三屆聯合國大會上，對於朝鮮問題曾經展開激辯。烏克蘭外長曼紐斯基歷斥五月十日南韓普選，美代表杜爾斯則說：「蘇聯背叛聯合國而拒絕參加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十二月六日，中美澳三

國建議，美蘇佔領軍在「儘早可行」的時機，在聯合國種種委員會觀察之下，自韓國撤退。動議中并要求聯合國承認美國支持的南韓政府爲朝鮮的唯一合法政府。蘇聯代表馬立克則譴責美國在南韓佔領區建立「警察國」，他又指斥聯合國監督的南韓選舉爲非法「在當時，美國佔領軍司令霍奇即承認選舉不能在自由之空氣下舉行。蘇聯雖已宣稱撤退北韓佔領軍，但美國佔領軍則將繼續留駐至南韓足夠之國防力量建立之時，因美國認爲，如美軍在現在撤退，則蘇聯訓練之北韓軍隊將席捲全韓，故美國建議中的「儘早可行」字句，並非退回撤軍之謂」。八日，馬立克提議撤銷舊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但聯大政治委員會在英美集團的壓力下，却否決了蘇聯的提案，而通過決議：「承認美國所支持之南韓政府爲朝鮮境內唯一合法政府，並設立新朝鮮委員會」。於是，美國在第三屆聯大中，又獲得勝利了。

綜上所述，大國一致的原則已告破壞，由於美國必欲堅持南韓以作反蘇基地，朝鮮已經陷於分裂的境地。現在，三屆聯大通過了承認美國支持下的南韓政府爲朝鮮唯一合法政府的決議案後，南北朝鮮的統一，恐怕還需要很艱苦的鬥爭。不過，南北朝鮮人民一致要求美軍撤出朝鮮，這種鬥爭將日趨擴大，美國分裂朝鮮的企圖，必定將遭遇朝鮮人民的打擊！

評英國國會——十字軍世界政府委員會

發起所謂「組織世界政府」運動

楊星森

十月份的海潮普上，刊出下面這一封信：

太虛大師：你接到這件十字軍世界政府計

劃大綱，想你一定很感興趣？這計劃是由英國國會的十字軍世界政府委員會所起草，並

由去年夏季在 Montreux 爲了組織世界聯合政府所召開的世界運動委員會所贊成。

現在這下面的幾個國家中：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智利、中國、丹麥、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挪威、巴基斯坦、南非、瑞典、美國，都有這種運動或忠實的贊助者。一些國際的保證者，對於十字軍的推廣，都放在計劃書的前面。新近加入為國際保證者意大利的羅西里尼 (Roberto Rossini) 和瑞典的赫斯爾克林夫人 (Madame Kestin Headland)。

我很希望得到你對於這計劃的批評及建議，如果在中國你能以最好的辦法發動十字軍運動，在最近期內希望得到你的復示！

英國國會十字軍世界政府委員會主席
彌靈敦 (Ernest R. Millington)

一九四八，六，二十九日
世界政府計劃大綱 (從略，請逕參閱海
潮音月刊)

原由中國佛教會請本師法慧上人譯出，在海刊發表，希望全國佛徒提供意見，在十一月底以前，彙寄英倫。並謂「吾國之簽名贊同該組織者，有胡適、竺士等」。信裏復希望收信人「對於這計劃的批評及建議」，不幸太虛大師逝世亦已逾年。筆者對於佛界粗具一知半解，今親彌靈敦諸位先生如此偉舉，不能不略抒管見以貢一得，雖然是一個平凡的見解，或亦不無聊資參考的價值。

原大綱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阻止世界戰爭」？這個神聖的大前提，除了瘋狂地精神病患者若希特勒輩魔魁以外，任何人都必認為這是一項賢明而且必要的理想與措施，不單慈悲平等的種教徒們願意協力。

但是我不明白的：第一，既有這樣好的理想何不就着原有的聯合國組織——按着大西洋憲章，各

處人民都能「在不虞匱乏與恐懼的自由之下度其生活」的最高原則下組織成的聯合國——予以強大的力的支援，寄以親切熱烈的期望？何必又不得煩勞的再起爐灶？致使時間與金錢兩不經濟？第二，組織世界政府目的既在防止戰爭。又何必「要接收每個國家現存的一切國家軍隊」？在名義上又要加個十字軍的花樣？

這幾點，初看起來頗覺費解，思之思之，我才心地豁然。可以借用邱吉爾翁回憶錄裏的一段話，這是「一軍極端反共的國家，(準備)組成帶狀，把西歐和蘇聯隔斷了！」(商務版頁九)三十年前一樞史的重演。也是邱氏所提示的「以戰止戰」的又一次翻版。它不是甚麼迷離難解的十字軍世界政府，老實說，應該割截去掉一半，公明更正地叫它反共十字軍。

可是遍讀計劃大綱及來信，不見一個「反共」字眼，免得刺激廣大的被遺奴役剝削的羣衆的苦痛的心情。由這隱藏用意的巧妙，具見大綱起草者的煞費匠心。我想，不獨傳統保守形式主義的佛教徒容易照泥，一般經濟落後國家的學界人士，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或者一時也許難把題目弄清。

我並不敢冒昧認為「主義思想定於一尊」或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合理，他們在過去多元政策中的殘暴鬥爭的作風和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都促使我們痛心疾首的憎惡。但在我想，鐵幕裏邊

的一切，也並非像某些人士所想像的那樣可惡、可怕，史坦倍克的蘇聯行 (A Russia Journal) 可做良好的證明。邱吉爾氏在他近年的言談著作裏，大聲疾呼：「善良者的軟弱如何加強了歹徒的惡意」；「慎重和隱忍的勸告，如何成爲造成嚴重危險的主要因素；爲了求安全和平生活而採取折中妥協的途徑，如何適足以引連禍難的中心」。(

同前書，頁十一) 儼然把蘇聯比成爲戰前納粹的轉國。

在幹部獨裁的表面，納粹與蘇聯似乎很難找出歧點，希魔治下的集中營與西伯利亞相比，或許也沒有甚麼不同。但是，被我們發現了，在本質上它們却有着最大最根本的顯著分歧點：一個是以大日爾曼，純種至上主義標榜，企圖征服、奴役或迫害全世界的各色人種；一個却是境內民族——無論是東方蒙古利亞、西方白俄羅斯、高加索與烏克蘭，一律平等！也可以說，一個妄想武力造成一家天下(那是歷史上許多野心家從來不會實現的幻夢)；一個目的是經過革命達到平等的天下(雖然它的成就如何猶待將來的事實證明)。這個天地懸隔的差別，距離上可真不小！

由這點說，無論對白人黃人黑人以及猶太人，反共十字軍的旗幟、口號，便遠沒有一反抗納粹侵略「的那麼鮮明與響亮了。尤其在不長進的東方民族裏，它們早就聽膩了南非、澳洲歧視一切有色的人種，美國國憲法裏面有奴視黑人的法律；它們膏願寄托希望於那個可望而不可及的蘇維埃式的民族平等的聯合。這個反常心裏，也許是以擁護基督教文明自居具有傳統優越感的英語民族所碰不到的，謝謝上帝的寬大，不幸這些，都是當前昭彰在人耳目無法扭轉的既成事實。

不久以前的美國康格先生曾這樣說：

「所值得注意的英國不放手香港，法國人正在很辣手的對付印度支那，印度西尼亞人正對抗荷蘭從事革命……有甚麼一定保證，我們能打算這些國家加入我們反蘇的集團？換一句話講，英美想得到一個國家統治者聯合起來的支持；蘇聯(却)得着人民聯合的支持。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統治者)

的幫助是不可靠的，倘若民衆推動向另一方面」。(見再生周刊沈立鈞譯蘇聯在下次戰爭中能獲勝利)

假使我們不能同意康氏這種觀點；算他都是一派胡說，偏見；我們接受Altop兄弟的見解，只要憑着九架現有的B二九型的飛機威力，能够炸平蘇境二十座大城八十座城鎮不出幾個月就勝利了。事實上世界事是否都是這樣的簡單容易？要不然的話，我們也該熱慮一下，一則在自己沒有必勝的把握；二則人家也並沒有像納粹德國一樣企圖奴役迫害其他種族的大斯拉夫至上主義。我們這種積極「企圖組織一個反蘇集團，徒然使得蘇聯重新更瘋狂地努力」備戰，加速度地造成世界人類的恐懼與不安，這却又是何苦來！

我可以說，換一個角度，反共非不必要，那是經濟獨佔的華爾街老闆們的事，因為共產黨的蔓延滋長足以威脅他們「金融寡頭政治」支配一切的威力。站在他們的立場，爲了他們的利益着想，這原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們忘了：財富集中，貧富對立，富人富到能够購買他人，窮人窮到出賣勞力不足以維生，正是製造共產勢力的溫床。何況私人拚命追求利潤的結果，造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然釀成不可避免的週期性的經濟風暴；像邱氏迴憶錄裏所說：「浮誇的想像和夢夢謀利的貪婪心，經過了偉大成就的本身，終於把這個光明燦爛的外表粉碎和弄棄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緊接着股票市場崩潰以後，物價的慘跌和結果引起的生產減縮，造成了普遍的失業現象……美國無工可做的達一千萬人，這個大共和國內的整個銀行業，陷入混亂與暫時崩潰之境」。(頁二四—二五)這種狂烈的風暴的騷擾，至少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不會遇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裏又有誰人能担保

它不再重演？

三十年前克魯泡特金氏在「一個反抗者的話」的跋文裏也曾說過頗足發人深省的話：

「只要某一些國家以爲自己應當從事製造品的大量生產來賺錢致富，並且把另外一些落後國家拿來任意分配，好讓那些落後國家來供給它們需要的原料，而它們自己却靠着別人的勞力積蓄起財富來；只要這樣的事情存在一天，那麼像上次大戰那樣殘酷的戰爭便不可避免，並且還有更殘酷的戰爭」。(畢修勾譯本，頁三四九)

這一位素來反對馬克斯權權專政主義的學者，也說出了這樣帶有嚴重性的預言警告，是值得我們細心尋味的。總之，在這種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問題本已存在；防止共產勢力蔓延的最好辦法，是使人人得到生活安定——使人人獲得「不虞匱乏與恐懼的自由」。不必徒恃飛機大炮。反之，武力防共，很難保不招致預期的惡果。那是說戰爭以防共號召開始，而後果却造成了貧窮、饑饉，反供給了共產黨一個滋長成大的良好機會。

至於實施全面社會保險制度的美國，已正常的走上溫和的費邊社會主義之路，已博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同情讚賞，更不必這樣大驚小怪。在每一個國民的生活都得到安全保障的國家裏，共產黨是用不着生根的。

說到我們東方國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們一方面供給外人比飛機大炮更慘厲的工業商品的侵略榨取；另一方面在亞細亞式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者與帝國主義那雙下的賈納資本家緊密結合一起的統治羣下，受着飢寒交迫的奴役和不顧死活的剝削。他們當前的急迫需要倒並不是廢除反共十字，而是如何的避免當前的飢餓、恐怖與死亡——解除這

雙重狼狽相倚的迫害！「人們在活得舒服以前他們必需先活着」；拉斯基教接的名言是任何人無法提出異議的。反共十字運動，可想而知在這種國家的統治者一定歡迎，但是，毫無疑義的它必爲國內死不得的廣大民衆所唾棄。

我們——釋迦遺教的信行者，受了良知的趨使，也決不願意爲極少數的特權階級人物張目。像邱吉爾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寫的「歐戰後篇」裏所說的那樣：「至於宗教，在基本論點上，雖然很賢明的避談戰爭，却用種種方式，對於所有戰鬥員不偏不私地予以鼓勵及慰勞」。這種西方宗教外形美麗的醜態，如我所理解的不錯，在純正無神論的佛教裏是不會有的。如所周知：釋迦牟尼是以反抗階級特權、提倡平等解放而立教的，一個自由進步主義的先導者，它主張「緣起無我」(Atman)大至上帝小而靈魂以破斥一切頑固自私的獨我迷信，破除一切宗教上的神話型式的大神——一個「流毒人類貽患無窮」的極端萬惡的東西」(空閑拙作佛法與神教，載海潮音廿九卷五—六期)

所以，我們——佛教徒與非佛教徒——基於人類的同情與正義，基於佛教的無我與自由，要向荒淫極侈的豪門特權堡壘爭取基本的生存。計劃大綱裏雖然說了「這是爲了把他們這些爲自己利益的國家政府支配的戰爭工具，以世界法律的效力改變爲保持和平的工具」的話，但是因爲你們和我們的出發點根本不同，也因需要要求都不相同，請原諒我們不願意——也不能够接受這隻友誼的手。

實在的，我很懷疑，起草這計劃的人，難以防止戰爭爲名，「其實只以拯救瓦解中的資產階級爲目的」？(克魯泡特金前書頁三〇〇)發起組織世界政府的人，果眞爲了人類和平着想，請仔細地尋末一下聯合國祕書長賴伊先生的一番話。想想它

是不是還有一點存在與成立的價值和理由？例如他

「如果聯合國用以防止另一次大戰，它必須是世界性的。它如果不夠世界性的話，就是陷世界於分裂，形成對立的集團，從而終於演成大戰……只有通過完滿的世界組織，我們才能希望建立持久的和平。聯合國為世界組織……它不能是一個世界政府。要不然，歷史與政府都大不相同的美蘇等國家又怎能都包括在裏面？要不然，歐洲古老的民族主義與亞非崛起的新的民族主義又怎能並存在同一和平的機構之內？要不然，信奉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有些歷時幾千年的人民又怎能帶到同一的疆地裏來？」（見賴伊氏）

聽望聯合國一文）他並且說：

「今天，在這個戰後處置陷於艱難而危險的時期內，聯合國是我們所有使世界會聚的唯一希望。在明天與可以預見的將來，聯合國是制止另一次大戰的唯一工具。在那一次大戰中，沒有戰勝國，沒有戰敗國，只有雙方——即全人類的整個毀滅！」

那位似乎極不得人心的康麥格氏也說過個人認為也還不無意義的話：

「倘若我們勸她蘇聯不要懼怕我們，或者我們能够引導她集中她的精力在和平與重建方面。倘若我們能以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公開的市場裏可以競爭來勸說蘇聯，我們可

以使蘇聯把宣傳的精力用在內政方面。

「倘若我們能勸說蘇聯，說我們站在聯合國立場，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是緩和和平之氣的適當工具，安全的成功與世界秩序的鼓勵，我們可以鼓勵蘇聯與我們自己，盡力於和平的勝利如同盡力於戰爭的勝利一樣。」（沈譯同前文，再生一九五期）

末後我要聲明：我雖然也算是太虛大師的門徒，但是我的批評建議，並不算能够代表大師，也不代表任何佛教團體，乾脆的說，只代表我個人幼稚而平凡的一種常識的看法。錯誤與否？希海內外專家學者有以教之！

通訊

泛湖南主義

（長沙通訊）

一 從「湘人治湘」說起

湖南省參議議長趙恆惕，本年六月間，與前主席王東原簽發，便提出「湘人治湘」的論調，中央要備重湘兩農民的血汗，就不得不連就一班有左右勢力的湘人，於是，「湘人治湘」由口說長成事實，李默庵在組織上不能取派系的諒解而告流產，終於指出萬國元勳程潛，奉為湘人團結的象徵，結束外省人四次治湘的政局。

程潛是以長沙緩署主任兼主湘政的，在任上除了管理三十萬湘人的政事外，最重要的還是與湘贛二省的緩靖工作，因此，他的主要點在維護江南的安全，當緩事之初，即謀建立五師的兵力，他自己及副主任方天黃杰等，都為兵源軍火備給

等事向中央打主意，中央以自顧不暇，同說要地方自籌，而對程潛自備長以上軍官又要統一委派，這樣，就使湘省政要的心中對中央隱存了不快的意識，加之中央向湖南要兵要糧，不管湖南建設事業，錫鑄保礦又重軍統制，這樣，一班社會領袖人物也對中央隱起不滿的星星之火。

在這些分裂感情的事實之後，接着有湖南名士「老虎總長」章士釗的「泛湖南主義」，就這樣，由「湘人治湘」到「泛湖南主義」。

日，湖南雖得偏安一隅，然大局如此，湖南人亟應籌謀自處之道，渠擬倡導「泛湖南主義」，以團結湘人，形成一堅實整體，先從保存元氣着手，再圖進一步形成國家安定力量，俾旋乾轉坤的打算……云云。到十一月，又有章士釗的應程潛主席之邀，起程返湘主編省誌，省府已在代寬住址的消息。

由這則新聞看來，章士釗的「泛湖南主義」顯然已引起省政當局的重視。在中國這種嚴重的局面下，各省只有自想辦法的辦法，程潛主席的「自衛、自強、自助」的政策，完全是適應環境的，既求安定又求建設的政策，緩署及省府的要員們奔走積極，積極快進訪湘，都是為着湖南的安定與建設，向宋子文打交道的。前福建主席劉建緒返長，發表談話，對程潛主

本社記者 梅望之

席的「三自政策」表示竭誠擁護，彭彰東的唐生智將軍，在數年的艱難生活中，體驗出鄉村生活的苦味，一變青年的權利思想，他極力贊成程潛主席的護農政策以及救湘運動，幾次親程潛主席及中央電邀，於月中來長轉京，共商國是並策救湘運動的進行，這是說明「泛湖南主義」或「三自政策」的理論影響；接着反苛索（糧食）反獨控（金銀外運），以及因省縣合作等等，這是「泛湖南主義」或「三自政策」的事實表現，茲分別報導於左。

三 糧食方面的反苛索

秋收之前，為着田賦徵借的數目問題，程潛主席對中央有一次反苛索的表示，原來中央要賦銀每元徵借二斗一升，省府及參省會呈請減為一斗二升，運了糧部。

否准，於九月應派專員督催，而程秉主
 應對總辦此種不顧人民死活的苛求行為深
 表不滿，在招待總辦的督催專員席上說：
 「湖南今年慘遭風水天災，湖濱十一
 縣收成僅二成半，中央應當體恤老百姓的
 困苦。」

但「專員」還是以中央的身位說「不
 能減少」，並說「徵借比起地方附加來更
 輕得多了」。這樣一來，程秉主席惱火
 了，拍桌大怒，說道：

「我的老百姓只能負擔此款，你叫
 我總統來也只會百担此款，讓你們做我的
 惡好了！」座後抽下了手帕，不管中央准
 不准，每元仍只借一斗二升，到十月五日
 會府十一次常會，連所有附加捐獻都一律
 停徵。

總辦碰了這一次釘子，又於十月下旬
 匯了一百萬金圓，要湘田糧處代為搜撈餘
 糧，當時正值兵市因糧價漲而大鬧糧荒
 的時候，田糧處長蔣國因此事非同小可，
 特向程秉主席請示，程秉主席以湖南已無
 餘糧，嚴飭蔣處長予以拒絕，蔣處長以上
 司文辦請示，亦不從完全拒絕，乃商求糧
 商賒借若干，蔣處長穩定後再購運，程秉
 主席以此乃屬相投撈，亦予以制止，並將
 該款「暫時借用」，總辦乃碰了第二次釘
 子。

接着總辦兩次釘子之後，總辦次長田雨
 時便於十一月一日親飛長沙，向湘田糧處
 大軍打官說，設湖南十月份十二萬五十大包
 軍糧欠八萬多包，十一月份二十五萬大
 包，要「只問目的，不必考慮手段」徵足
 限期交出，否則，貽誤軍糧，決按軍法
 嚴辦。

程秉主席對這一個嚴重問題，於二日
 晚招待田次長，田次長說明他的任務有三：
 一、督徵賦糧，二、催辦軍糧，三、要
 求開放省幣權，程秉主席對第一項極表
 贊同，對其餘二項說：「湖南省今年歉收
 ，供應本省食糧尚感不足，省政府對糧食

外流不得不加節制，軍糧有賦抵充，何能
 又要大量採購？中央對民間情形自然知道
 ，因我已幾次去電報告，何必仍不信任，
 不顧人民的死活？本省應設收糧的賦糧自
 當運辦，至於額外的購糧開禁却礙難照辦
 ！」田次長再說明中央的困難及法令的時
 候，程秉主席也如對總辦一樣拍桌大吼
 說：「額外的軍糧我一粒也沒有，要
 將總統來也一樣沒有，我的老百姓不能讓
 他餓死！」三日，田次長便憤憤地去職，
 田糧處長表示：賦糧許多招待費了。
 但是，程秉主席到京之後，湖南軍糧
 決不承認，但也花過許多招待費了。
 已在糧食會議中增為一百二十多萬大包，
 對糧食禁運事也有「經主席核准者」的例
 外，這是對中央的讓步。

四 反對中央銀外運與自力經濟建

說

接着反對中央苛索之後，又有反對央
 行擴張及自力經濟建設的運動，財政當局
 于「八一九」宣佈財政改革，收兌民間金
 圓外幣，限十月底禁止民間持有，屆期未
 領，十一月十日又開禁，其間為時僅七
 十天，政府雖稱令少改，但人民對政府仍
 是唯命是聽。在湖南，收兌的金銀共值八
 百萬元，為全國各地收兌最多的，十月底
 傳出消息，說中央銀行要將湖南所收兌的
 金銀運滬，湘省商農工團體羣起反對，于
 十月廿八日聯電省府及各有關主管，原文
 摘錄如下：

「……竊查新幣發行，收兌金銀即作
 準備金，以穩定人民信心之用，如此則湘
 省地處後方，秩序安定，為準備金極安全
 之儲蓄地，茲為加強湘民對新幣之信任，
 減少社會心理上之波動，務須極速，以固
 民心，而策安全……」

隨後，金銀運滬的傳說愈來愈繁，十
 一月一日上午，省參會駐委開了次緊急
 會議，下午，參商農工各界代表二百人，

又在省參議會召開緊急聯合會議，大家激
 昂到了極點，說這是湖南人的血汗，留在
 湖南作為金圓券的保證則可以，湖南是一
 個安定的後方，又可以保存，如果央行定
 要運走，去換子彈，又不給湖南用，要湖南
 用糧食去換，將一些毫無保證的金圓券放
 在湖南運用，使湖南一點僅有的「元軍」都
 不能保存，則不答應，其次關於物資交換
 ，湖南運出的太多，從外面運進來的却太
 少，太不合理，必須向中央力爭。熱烈開
 的討論了兩點多鐘，得出兩個結論：一、
 反對金銀外運，二、疏導工業原料來源。

五 湘粵及四省軍軍經濟合作

全體代表包圍了中央銀行，最初由三
 人進去說明，要求央行將收兌的金銀點交
 清楚，由全體代表「查封」，逼得央行沒
 有辦法，第一步將數字公佈，計：

- (一) 黃金：三萬三千兩
- (二) 白銀：二十萬兩
- (三) 銀元：八十萬元

看了數字，大家仍是不肯，要求「查
 封」或給予保證，央行經理用電話找省府
 秘書長齊介松來，代表們說「湖南省與
 金銀共存亡」，「要郭秘書長保證不運走
 」，郭說：「這是央行的事，政府不能保
 證，看經理如何？」經理說：「我是守倉
 的，沒有辦法作主。」代表退一步要求郭
 秘書長予運走之前這一個表示，結果經理承
 認「有運走的消息即轉告郭秘書長，郭承
 認通知代表們，於是代表們像勝利者的歡
 狂地說：「請新聞記者作證，請新聞記者
 作證！」便紛紛散去，結束了這一場羣眾
 運動。央行對各界的反對外運當然不能輕
 視，實有以同等價值的五角銀幣兌換的傳
 說，現雖是以整圓政策改變了，當時代表
 ，但他是以表明國策的力量了，當時代表

們說對今後政府的超出法律以外的剝削，
 都要以團體的力量來反對！
 清極的從事苛詐之外，又積極的運動
 各界力量，反對苛捐雜稅建設生產的運動
 ，於十月中旬市場起大風波的時候粵組「
 物資調節處」下設花紗、布疋、糧食、油
 坊、百貨、燃料、工業原料七組，除長市
 外，各重要城市分設「調節組」，其性質
 由供給性的修正為建設性的。「政府與商
 人基於互助互信之結合，以營業為主，以
 政治力量為輔，引導本省工商業走上
 生產事業之途徑」，營業採「民資民營，
 統籌統銷」原則，資金採「實物」制，
 由七業投資，原定十一月開辦，已決定由
 程履勳為經理，但至今尚未正式成立。

五 湘粵及四省軍軍經濟合作

十月下旬，長校署副主任黃炎壽等位
 等訪粵，對湘粵軍事經濟合作問題，胡宋
 子文作了一次初步談判，黃等返湘，胡宋
 席胡家鳳來長出席出綏靖會議，隨後陸行
 轅副主任張運，于十月廿七日偕同張運
 界十二人來湘報聘，張氏抵長後，強強在
 國家嚴重之局面下，除了團結合作，另無
 第二條路可走，並將湘粵合作範圍擴充到
 桂贛等四省，首先便重理物資交換，將來再
 談礦產開發，張氏留長一週，其間與程秉
 主席經署省府及張氏留長各界要商談多次，
 訂立「君子協定」，即以該會紀錄經雙方
 負責人簽名，各執一份為根據，初步決定
 物資交換：湖南方面以糧食、植物油、生
 豬等項，廣東方面以棉紗、白糖、工業原
 料供湘，再一步為粵組兩大銀團，大量投
 資湖南工業事業，湘省投資礦產向委會
 收回控制權，亦擬大量投資開採，將由年
 產千二百噸增至二萬四千噸，關於軍事合
 作方面，湘粵邊境區聯防及軍力配備問題
 ，長校會中已有決定，由葉舉統一指
 揮，十一月旬初的消息，粵宋子文已決定
 一、贈予湘省大批子彈，二、贈予湘省

等訪粵，對湘粵軍事經濟合作問題，胡宋
 子文作了一次初步談判，黃等返湘，胡宋
 席胡家鳳來長出席出綏靖會議，隨後陸行
 轅副主任張運，于十月廿七日偕同張運
 界十二人來湘報聘，張氏抵長後，強強在
 國家嚴重之局面下，除了團結合作，另無
 第二條路可走，並將湘粵合作範圍擴充到
 桂贛等四省，首先便重理物資交換，將來再
 談礦產開發，張氏留長一週，其間與程秉
 主席經署省府及張氏留長各界要商談多次，
 訂立「君子協定」，即以該會紀錄經雙方
 負責人簽名，各執一份為根據，初步決定
 物資交換：湖南方面以糧食、植物油、生
 豬等項，廣東方面以棉紗、白糖、工業原
 料供湘，再一步為粵組兩大銀團，大量投
 資湖南工業事業，湘省投資礦產向委會
 收回控制權，亦擬大量投資開採，將由年
 產千二百噸增至二萬四千噸，關於軍事合
 作方面，湘粵邊境區聯防及軍力配備問題
 ，長校會中已有決定，由葉舉統一指
 揮，十一月旬初的消息，粵宋子文已決定
 一、贈予湘省大批子彈，二、贈予湘省

金省所屬電器器材，三、湘省編練新軍所備武器彈藥，由宋先行發給，再用湘省儲備換取外匯，向美軍火商洽購……現在，宋子文扣留的派紗已經放行，並源源匯行

南遷聲中話穗垣

(廣州通訊)

本社記者 巨 吼

自徐蚌之戰運轉後，政府的南遷問題，已為今日政壇中，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新聞，不過為中外輿論起見，政府當然非至真正兵臨城下的時候，是不會承認南遷這一類面子的措施，但依照目前軍事形勢運轉，與及未來中外寇盜雲集境域，巨型運輸飛機，此起彼落之熱鬧情形來看，則實際政治重心南移的跡象，已隨着戰局的演進，而日登明顯。

在香港也有十個台灣團體抗議把台灣變成內戰基地，與向里邦那舉舉行台灣公民投票，以決定它未來地位的願心宣言出現。而廣州則是國民黨發跡地，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在這兒發軔出發，一部民國史上，廣東都對這個政府有過貢獻，再加上了宋子文銳意經營了一年多的人事關係，從地利到人和的條件，都夠得上為「戲園」新都。

這種合作，當然是嚴重動搖下自來生存與發展的辦法。可是因為流亡四起，今日湖南政要已不敢再談自力更生。章士釗至今未返湘垣，唐生智想回湘訓練五十

萬新軍也不能如願，「泛湖南主義」，怕會在中央獨裁之下消滅去吧，正不敢說。(十一月十八日長沙)

在目前南遷之路，是有兩條，一為台灣，一為廣州，在地理上來講，台灣是有着日人遺下的良好工業設備，而又沒有「匪患」的一塊乾淨土，但它畢竟是這島南海的孤立省份，與內地遠隔着一道海洋，只能作為海軍及訓練新軍的基地，如果作為「中樞轉運」所在地，則在指揮上似乎尚欠靈捷，但在廣州方面，既有黃埔港與廣九鐵路之出海口，復有伸向華中腹地之粵漢路，街接湘桂，浙贛等鐵路，又有粵，桂，湘，閩，贛等五省公路，與內地交通四通八達，是一個最合標準的，美援物資運站。同時又毗連「兩湖熱天下」的中國大米倉湖南，兵役制度最完善的廣西，這可以像一九二六年北伐時代那樣，由南而北的再度統一全國，退可以防守北起福州，東至台灣，西至雲南四川，南至廣州的華南區，偏安一時以特外。在政治環境上，台灣是經由日本人五十年的長期統治，既有「二二八」事變於前，又有台灣獨立運動儲備於後，而最近

在十一月十八日宋子文，在軍出師後方各省主席會議議後，名流專家就隨着紛紛南下，結紮於途，極一時之盛，粵軍，政，濟三方面都展開了種種新歡，余漢謀的南遷，就是為劃到在穗訓練，一個龐大的粵，桂，湘三省子弟的第二練兵團，他把南京軍事顧問南調來穗，分五組協助訓練此項軍工作。為了配合新都的運送，廣東軍事當局，已準備着一個大規模的接濟各縣「股匪」計劃，宋子文把剛由轉籍歸來的前黃百福兵團副司令黃國棟中將請出來，充任保安副司令兼保安處處長，就通過黃氏的在「戲園」戰場上作戰經驗，來徹底完成這個清剿方案，並決於在月內，向湘，桂及粵省各剿匪集結了，擴編包括戰車，工兵，砲兵，重砲，通訊團，並且連軍糧專署政當局也未雨綢繆，儲備了一千五百萬石，據傳日前廣西的開闢賭禁，也是與今次南遷軍區大建軍經費問題有關，廿八年度廣東兵額，也決定着

加倍，達二十三萬餘人，正當宋子文，把華南各省，人力，物力，財力，都配合在「戲園」軍事行期上之時，十二月十九日，湛江市（前廣州灣）即發生再次運突騷，第十清剿區司令官張君嵩中將，副司令官郭伯涵殉職的刺耳新聞出現。今日政府，唯一希望挽回這棋局的「還魂湯」，當然是美援，在軍運不保後，如何來解決美援物資轉運問題，是目前當務之急，於是宋子文於十一月廿六日，偕同美國經濟合作總署，華南辦事處長盛森及大批智囊的飛港。就是準備以內河權的開放，公開萬人一策，來換取美援運港時的聯運辦法，記得孫科於受命組閣後，第一次發表談話時，早已說過：「關於開放內河航運權，勢在必行，這對我們極有便利」，這一幕「敗家子」的把戲是早晚就要上演的。

現在已遭運到了沒有下文的尷尬局面，但一般引領待「援」的人，似乎向去死心，在廣州應運而生，成立了海南經濟開發委員會，來準備執行運用美援，推動農業生產，與工業增產，因經費支絀，久已停頓的黃埔築港，粵漢路重建，浙江水電，向牙蘭煤礦等工程人員，又忙於編工作計劃，擬提遠方案。蔣夢麟，晏陽初相繼罹難，大噴運用美援，復興農村的偉論，美援的建設華南大有呼之欲出之勢。

JUSMAG 隨寒風落葉而香消玉殞了

(南京通訊)

王正平

萬新軍也不能如願，「泛湖南主義」，怕會在中央獨裁之下消滅去吧，正不敢說。(十一月十八日長沙)

